



朱熹《白鹿洞赋》在朝鲜时代的传播与转化

曹虹

摘要:朱熹《白鹿洞赋》在朝鲜时代有其传播轨迹与影响力度,其间涉及朱子理学及书院制度对朝鲜文教体系的深刻塑造。朱熹赋作通过次韵拟仿的形式在朝鲜时代引发广泛回响,成为海东儒学家表达教育理想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以朝鲜学人周世鹏《白鹿洞赋》为代表的次韵创作,不仅是对朱熹文学典范的追摹,更是其创办书院、推行儒教的教育实践在文学上的投射,形成“想白鹿之经营兮,心万古而一符”的自觉传承。此外,朝鲜学者在经学阐释中,促成与朱熹《诗集传》的某些辩证接受的景观,通过《诗经》“青衿”意象的汉宋解释差异,展现朝鲜学人在尊崇朱子学的同时融通汉学传统的学术取向。这种跨区域的文教互动不啻是一种具有主体意义的“文化记忆”建构,使朱熹及其赋作在朝鲜逐渐转化为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历史资源,从而为东亚书院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朱熹;《白鹿洞赋》;东亚书院文化;文教互动;经学阐释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2-0106-08

朱熹作为一位伟大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其兴办白鹿洞书院的实践,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乃至东亚的教育范式。朝鲜时代^①书院近五百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其教学思想、学规体系与书院规制等受朱熹的影响极大,甚至可以说,朝鲜书院受朱熹影响、接受《白鹿洞书院揭示》后,才真正具备系统化的教育意义。在朱熹兼具教育家与辞赋家身份所留下的作品中,《白鹿洞赋》尤为值得关注。该赋随理学与宋代辞赋东传至朝鲜,在海东学坛赋苑引发深远回响。朝鲜赋家不仅热心于品读效慕朱子《白鹿洞赋》,更创作出多篇以本土书院为题的辞赋,且在形式上多标明为对朱熹原赋的次韵之作。这一批次韵拟仿之作,实为朱熹《白鹿洞赋》在东亚文化脉络中的重要回响,对理解中朝书院文化的互动机制与经典文本的跨域阐释,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

一、《白鹿洞赋》创作及朱熹的传道情怀

白鹿洞书院自南唐创建,历经两宋,经历了创建、废弃、复兴的曲折过程。正是由于朱熹任新安郡守时主导书院复建,才使白鹿洞书院从榛莽之地又变为弦诵之所。据吕祖谦受朱熹之托所作的《白鹿洞书院记》载,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巡视属地时发现书院遗址,感慨此为唐代李渤旧隐、太宗赐经办学之地,痛心其久废不修,认为重振书院是儒者之责^②。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复建不仅体现在恢复馆舍讲授,而且体现在重建学风统纪。吕氏《白鹿洞书院记》中提到,宋初至嘉祐年间,二程、张载“倡明正学”,至熙宁之际“王氏之学方兴”,王安石之学的弊病直接影响了教育,“晚进小生骤闻其语,不知

收稿日期:2025-07-15

作者简介:曹虹,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23),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东亚汉籍研究。

亲师取友以讲求用力之实，躐等陵节，忽近慕远，未能窥程、张之门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贤圣之病”^[1]，忽视师友讲习与踏实功夫，是为教育之困。朱熹亦多次批评王安石之学“躁率任意”“杜塞公论”，认为其有损教育正轨^③。

一般而言，书院碑记以记事为主，兼具褒贬；辞赋则长于颂赞，且因其“体物”特性而兼具纪事功能。朱熹于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撰写的《白鹿洞赋》，据黄震《黄氏日钞》分析，全赋可析为四章：“一章言唐李渤读书旧地，而南唐因创书院。二章言自太宗、真宗增辟而废于熙宁。三章言今日之再造。四章言讲学之要领，而乱之以德业无穷之思。”^[2]赋中“言今日之再造”，描写了书院的重建过程：“夫既启余以堂坛，友又订余以册书。（寻访之初，得樵者指告其处，客杨方子直遂赞兴作之谋。既而刘清之子澄亦哀集故实来寄。）谓此前修之逸迹，复关我圣之宏模。亦既震于余衷，乃谋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纲纪，吏竭蹶而奔趋。士释经而敦事，工殚巧而献图。曾日月之几何，屹厦屋之渠渠。（事具吕祖谦伯恭所作《书院记》。）”^[3]朱熹在赋中不仅记述营建之劳，更寄托其熔铸儒学宏规的理想。除赋体本身的“体物”功能外，他还参用了随文“自注”的方式以补充纪事，如关于建筑时间、规模等情况，朱熹自注曰“事具吕祖谦伯恭所作《书院记》”。赋体自注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手法，可追溯至刘宋时代谢灵运《山居赋》，此种手法虽不常见，却可以增强叙事的真实感与层次感^④。

当然，辞赋“体物写志”的本质属性，使作品在客观描写的同时，更易抒发主体情志。朱熹在赋中以“乐”与“怅”，表达了对白鹿洞书院奠基历程的回顾及其情感波澜：

自升元之有土，始变塾而为庠。俨衣冠与弦诵，纷济济而洋洋。（《庐山记》又云，南唐升元中，因洞建学馆，置田以给诸生，学者大集。乃以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授。《江南野史》亦云，当时谓之白鹿国庠。）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运？皇穆穆以当天，一轨文而来混。念敦笃于化原，乃搜剔乎遗遁。盼黄卷以置邮，广青衿之疑问。乐菁莪之繁育，拔隽髦而

登进。（谨按《国朝会要》，太平兴国二年，知江州周述乞以九经赐白鹿洞，诏从其请，仍驿送之。六年，以洞主明起为蔡州褒信主簿，旌儒学、荣乡校也。）迨继照于咸平，又增修而罔倦。（《庐山记》又云，咸平五年，敕重修，又塑宣圣、十哲之象。）旋锡冕以华其归，琛亦肯堂而诒孙。（郭祥正《书院记》云，祥符初，直史馆孙冕以疾辞于朝，愿得白鹿洞以归老，诏从之。冕未及归而卒。皇祐五年，其子比部郎中琛即学之故址为屋，榜曰“书堂”，俾子弟居而学焉。四方之士来者亦给其食。）惟茂草于熙宁，尚兹今其奚论？（《庐山记》熙宁中作，已云鞠为茂草矣。）^{[3]4-5}

朱熹有感于时代与书院的兴衰关联，饱含深情地追溯了白鹿洞书院从南唐到北宋初年的兴衰历史。南唐升元年间国势虽微，白鹿洞却迎来“白鹿国庠”发展时期。宋初文教昌明，书院受到重视与持续修缮，这让朱熹备受激励，也促使他思索如何才能实现教化理想。朱熹既感动于历代兴学的因缘，也为熙宁年间书院荒废而怅惘深思，由此愈发明确自身推行教化的使命。

《白鹿洞赋》也体现了朱熹作为教育家和传道者的情怀与方法，即黄震《黄氏日钞》所称“讲学之要领”：

山葱珑而绕舍，水汨瀾而循除。谅昔人之乐此，羌异世而同符。伟章甫之峨峨，抱遗经而来集。岂颛眺听之为娱？实观宫墙之可入。愧余修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给？矧道体之亡穷，又岂一言而可緝？请姑诵其昔闻，庶有开于时习。曰明诚其两进，抑敬义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怀，谨巷颜之攸执。彼青紫之势荣，亦何心乎俯拾！”^{[3]5}

面对“道体无穷”的学术境界，朱熹强调“明诚两进”“敬义偕立”，实则是将学问探求与人格修养融为一体，贯通天道与人道。“明诚两进”意味着在穷理致知中实现自我觉悟，在诚意正心中抵达真实无妄；“敬义偕立”则指向内外交修，持敬以涵养心性，集义以践行伦理。此种教育观，不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朱熹对“圣贤之境”的实践诠释：唯有在格物致知中不断“商量旧学”，在涵养用敬中持续“培养新知”，方能抵抗世俗势

荣的侵蚀,成就内外如一、知行合一的儒者人格。

朱熹的教育情怀既产生于他对自然与人文相融的敏锐体察,也根植于他对历史与当下的深刻观照。他观“山葱珑而绕舍,水汨瀾而循环”,感“谅昔人之乐此,差异世而同符”,正是在山水形胜与人文传承的交互映照中,确立了书院教育的精神空间。书院往往依山水而建,环境幽静,适宜读书。更重要的是,朱熹认为在书院中自然秩序与人文教化可相互印证,即山形水势中所蕴藏的“理”,与心性修养、经典传承中所彰显的“道”,实为同一宇宙法则的不同呈现。因此,书院不仅是讲习经典之所,更是体认天理、涵养性情之境。在此意义上,朱熹的教育理想超越了单纯的知识传授层面,升华为一种融生命修炼与精神开拓于一体的整体性教育理念。其理学思想与诗性感悟相互交融,形成一种既具有哲学深度又洋溢审美意味的教育诗学。这也为其后朝鲜儒学家在次韵仿作与书院实践中所体认的“异域同符”奠定了精神基础。

二、朝鲜的书院创建与书院文学的形成

朝鲜时代对朱熹辞赋的广泛拟仿,植根于高丽中期以降理学及两宋文学持续东传的历史语境。高丽中后期,随着苏轼、黄庭坚诗文风尚传入朝鲜,李仁老、李奎报等文人的创作已明显带有仿拟宋人的痕迹,文风近似东坡。至高丽末期,程朱理学渐兴,效法宋文之风更盛,为朝鲜时代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调^⑤。在赋体创作领域,宋代律赋与文赋亦成为高丽后期文人学习的主要典范^⑥。李穡在《寄赠金敬叔少监》中,生动地勾勒出当时朝鲜文人追摹宋代文化的面貌:“泰山北斗韩吏部,力排异端仍补苴。欧王曾苏冠赵宋,中间作者皆丘墟。程朱道学配天地,直揭日月行徐徐。《文选》《文粹》《宋文鉴》,《通典》《通考》精英储。微辞奥义尽呈露,精鉴博采相乘除。”^⑦这段文字清晰地呈现出朝鲜文人对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等文坛大家,直至程朱理学的接受谱系。

在此背景下,朱熹的性理之学与文学著述在朝鲜时代备受推崇,其存世赋篇几乎全部被

朝鲜文人追摹和次韵^⑧。据笔者统计,次韵拟仿《感春赋》的作品共31篇,次韵拟仿《白鹿洞赋》的作品共8篇,其数量远超对欧阳修、苏轼等宋代名家赋作的拟仿^⑨,反映出朱熹在朝鲜文坛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文人对朱熹《白鹿洞赋》的推崇与仿写并非单纯的文学追摹,其背后蕴含着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多数仿写此赋的作者本身即是书院教育的倡导者或主持者。这种“作者即实践者”的双重身份,使得赋体创作与书院建设密切互动,既生动记录了朝鲜书院创制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深刻体现了“文以载道、教以化成”的文教互动的传播范式。

这种文教互动以及对朱熹的推崇不仅体现在文学层面,更直接推动了朝鲜书院制度在实践中的构建与成型。朝鲜时代书院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深受中国宋代书院特别是朱熹所振兴的白鹿洞书院的直接影响。这一过程不仅是教育组织形式的空间移植,更是文化理想与儒学实践模式的整体性传递。朝鲜书院自创建之初,即将白鹿洞书院视为核心典范,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书院精神的自觉认同。朝鲜儒学家普遍认同朱熹振兴书院、昌明正学的使命,将白鹿洞书院视为“吾儒之范模”^⑩。这一精神认同在朝鲜最早的书院——白云洞书院(后赐额“绍修书院”)^⑪的创建中得到集中体现。其创立者周世鹏在《白云洞次朱文公白鹿洞赋》中直抒“想白鹿之经营兮,心万古而一符”^⑫,彰显了自觉接续朱子学脉的意识。对书院精神的认同激发了朝鲜文人对朱熹教育理念的接受与思考,这成为他们创作体式上模拟次韵朱熹作品的内在动力,从而形成了朝鲜独特的书院文化现象。在书院实践活动中,朝鲜文人把白鹿洞书院当作教育典范来推崇,他们在创作中自然地将本地书院景观融入赋题,如尹斗寿《涤热台次晦庵白鹿洞赋韵》、朴长远《曲江赋次朱子白鹿洞赋韵》、赵镐来《卧龙潭赋次朱夫子白鹿洞赋用其韵》,从而形成了以文记教、以赋承道的书院文学传统。

作为《白鹿洞赋》的第一篇次韵之作,《白云洞次朱文公白鹿洞赋》是周世鹏创建书院实践活动的文学产物。这种在书院实践中发展书院

文学的做法,本身就是对朱子经营白鹿洞书院神髓的继承。周氏于赋中自述膺命守土、创院兴学之由,追踵白鹿之志昭然可见。鉴于此赋的特殊地位,兹将全篇引录:

肃承恩于玉阶兮,宰兴州之旧疆。念孩爱而长敬兮,孰云初赋之无良。咨晦轩之故里兮,闷穉耜于砚塘。(砚,墨池,今废为水田。)溯竹溪而穷源兮,仰小白之崑冈。猗若人之纯美兮,揭日月于洪荒。寥礼朱而望孔兮,顛食菲而饮芳。纳藏获以卫道兮,勤一心于我庠。顾余学之杯潦兮,夙有志于望洋。

惕鸡鸣以孜孜兮,法健行于天运。谅盈科而后进兮,夫固原泉之混混。苟得依乎中庸兮,亦甘心于行遁。跂前修而僬勉兮,慨无及于答问。矧克配于宣尼兮,与群弟而同进。惟圣朝之致享兮,逮州县而无倦。夫何里社之阙祀兮,俾遗恧于来孙。年二百又四十兮,恍亲承其绪论。

访宿水之古寺兮,认当年之读书。白云横而如昨兮,至人复其楷模。步废础而延伫兮,招巷老以是谏。晴峰轩眉而献状兮,幽涧舍瑟而争趋。喜立庙之得地兮,乐书院之继图。彼章甫之波从兮,沛如水之决渠。思不夺乎农时兮,惧日月之其除。想白鹿之经营兮,心万古而一符。改洞号曰白云兮,矢我事之或集。俨庙貌之焕赫兮,又遗像之迎入。

溪有毛兮,山有柏兮,庶筵豆之可给。结幽兰以钦钦兮,怅绝绪之谁缉。辟堂坛以藏书兮,冀有补于讲习。水洗洗其不舍兮,山岷岷其卓立。岂柯则之在远兮,惟一德焉允执。譬清潭之印月兮,又孰可以手拾。

乱曰:晦翁晦轩,贯一璆兮。洞入白云,别繁樛兮。庙可荐荔,堂可游兮。山高水长,偕止流兮。以俟来哲,复何忧兮。惟饱与安,匪所求兮。^⑬

赋中,周氏将白云洞书院的地理位置、学脉传承与白鹿洞书院紧密联系起来。且通过“咨晦轩之故里”“年二百又四十”诸句,将白云洞书院的精神渊源指向安珣所传之朱子学脉。安珣乃高

丽大儒,高丽忠烈王时期(13世纪末),其作为使臣前往元朝,接触到了新兴的朱子学,遂将其经典著作(如《朱子全书》)带回高丽,并致力于推广,为后来朝鲜王朝以朱子学为统治理念奠定了基础。“咨晦轩之故里兮”显示作者与安珣在地域上的同乡亲缘,又以“年二百又四十兮,恍亲承其绪论”,直言两人都是朱子学的崇拜者,在时序学脉上联结。赋末“乱曰”更以“晦翁晦轩,贯一璆兮”,点明晦轩安珣与晦翁朱子之间形成的高度精神共鸣。由此可见,白云洞书院不论从地理渊源、学统承续,还是精神指向、教育实践等方面,均呈现出对白鹿洞书院典范的多层次追随与继承。

二是书院规制与教学理念直接效法白鹿洞书院。朱熹所订《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朝鲜书院普遍遵循的学规,其“明诚两进”“敬义偕立”的讲学要领,以及书院选址于山水之间以涵养心性的空间理念,均在朝鲜书院中得到延续与实践。白鹿洞书院的经营、教规与精神往往被当作一种活化的存在,深刻影响了相关文学创作,使辞赋作品呈现出自然、灵动的审美气韵。例如李栋完《壁画白鹿洞赋》以古赋对话的方式再现如画之境,不仅体现了对朱子原赋的精神理解,而且从侧面印证《白鹿洞赋》对朝鲜绘画艺术的渗透。再如朴世镛因深感朱熹创设《白鹿洞书院学规》(亦称《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特殊意义,遂变通赋题,创作了《揭白鹿洞规赋》,直抒“乃所愿则学朱”^⑭之志。这些作品表明,朝鲜儒学家和赋家虽惯以次韵仿拟《白鹿洞赋》,但在命题与旨趣上仍展现出因应本土实践的主体性与灵活性。

白云洞书院的建成以及获得朝廷“绍修书院”赐额具有标志性意义,推动了朝鲜书院制度的本土化实践。在白云洞书院的示范作用下,朝鲜各地相继创建书院近700所,如陶山书院、屏山书院等,此后地方儒学教育网络不断扩展。2019年,包括绍修书院在内的9座韩国书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历史价值与典范意义由此获得国际层面的权威认定。作为书院制度的开创者与书院文学的首倡者,周世鹏的《白云洞次朱文公白鹿洞赋》不仅开创了朝鲜书院赋的传统,其次韵

形式亦为后世同类赋篇所继承。后人如安永镐在《次白鹿洞赋》的“小识”中,便明确追溯“白云洞有次白鹿洞赋二篇,盖周慎斋先生创院时赋其事;其后族先祖竹溪公丁龙蛇难,入院又叙其时事。谨追二公意,有感而作”^⑧,显示出周世鹏的典范影响。其可贵之处在于,赋作与“创院”之教育实践相辅相成,使文学书写深植于制度奠基过程中,因而尤为后世所铭记与追慕。值得注意的是,与周世鹏“赋其事”的白云洞书院的书写路径不同,安永镐的《次白鹿洞赋》从更为宏阔的时代教育机遇着眼,流露出对白云洞创院立基之业的自豪与认同:

圣祖兴而崇儒,奎再昌于图书。曰兹院之创始,乃慎翁之宏模。负白鹿之遗制,暨一国而广谏。蒙抱经而群游,士执笏而恭趋。石垂箴于敬字,亭寓慕于极图。获神助于鑰金,求坟籍于石渠。绍圣学以修己,宣宝额于玉除。^⑩

安永镐于赋首即彰明对当世崇儒之风的自信,并寄寓地域文教振兴之使命感:“惟天相夫大道,启文明于我疆。”^⑩其句虽化用朱熹原赋“承后皇之嘉惠,宅庐阜之南疆”,却将叙述重心从自然地理转向了朝鲜本土儒学的主体性彰显。这类创作表明,朝鲜文人在追慕朱子典范的同时,始终致力于将书院精神与当地文教实践相结合,从而在仿拟的文学形式中,持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与地域意义。

三、辞赋文本与经学文本的互证

朝鲜学人对朱熹《白鹿洞赋》的接受,不仅仅停留在文学形式的仿拟上,更深入至经学阐释的层面。他们通过细致比对朱子的解经著作与文学创作,在汉宋经学的差异间寻找会通与调适的可能,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本互证现象。

在朱熹原赋中,“盼黄卷以置邮,广青衿之疑问”一句,以“青衿”指代学子,描绘书院中质疑问难的教学场景。朝鲜次韵赋家如朴长远,在《曲江赋次朱子白鹿洞赋韵》中亦承袭“青衿”意象,写下“蔚青衿之济济兮,纷左右乎胶庠”^⑩。“青衿”出自《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然而,在经学解释史上对“青衿”

的理解存在着分歧,尤其是汉宋经师的解释存在较大差异。大要而言,汉代经学主于政治教化与伦理隐喻,《毛诗序》认为此诗为“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4]345},将“青衿”释为学子之服,意在批评乱世教化不修。唐代孔颖达疏进一步将“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解释为“责其废业去学也”^{[4]345}。至宋代理学,朱熹突破汉儒解释框架,《诗集传》直言此诗为“淫奔之诗”,视“青青子衿”为男子衣饰,女子因恋人未至而嗔怨^{[5]85}。同一意象,在政教喻义与男女私情之间,形成了汉宋诠释的鲜明对立。

朝鲜学人敏锐地注意到,朱熹在《白鹿洞赋》中对“青衿”的用法,实际上更贴近汉儒的“学校”之喻,与其《诗集传》中的“淫诗”说构成了一种文本间的张力。由此可见,朱子的解经著作和传世创作均受到朝鲜学人的细心阅读与比较,其中最突出者当数丁若镛和俞莘焕。

丁若镛《诗经讲义》中对《诗经·郑风·子衿》有如下条对:

御问曰:“青青子衿,虽未见其必为学校之诗,而亦未知其必为淫奔之诗。未知如何?”臣对曰:“朱子《白鹿洞赋》曰:‘盼黄卷以置邮,广青衿之疑问’,既以青衿为学子之服,则平日之论,有可见者。按晋怀帝下诏征虞喜曰:‘儒雅陵夷,每览子衿之诗,未尝不慨然。’杜甫诗曰:‘训谕青衿子,名惭白首郎。’可见古来不以为淫诗也。”^⑩

丁氏的辨析表明,朱熹对经典的解释并非单一封闭,也并非刻意与汉训对立,而是存有一定回旋与兼容的空间。类似于曹操《短歌行》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表达对贤才的渴慕,丁若镛还举出晋唐文献中沿用“青衿”“子衿”指代学子的用例,揭示该意象在教化传统中的延续。如此理解朱熹,比恪守《诗集传》一解而排斥其他说法,更有助于领会经典阐释与修辞运用的丰富层次。从书院教育的语境出发,“青衿”的汉儒训解,即象征学子与学校教化,显然更契合书院讲学、质疑问难的文化氛围。朱熹在《白鹿洞赋》中以“广青衿之疑问”描绘书院场景,正可视为对汉唐经义传统的呼应。这种文本间的互参,不仅为朝鲜学者提供了调和汉宋之学的依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朱熹作为理学宗师的

的严格门户形象,展现出其思想与写作中多维、交融的一面。在思想史脉络中,汉宋之学并非只有对立一途,二者间的对话与暗通,亦构成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诠释路径。

俞莘焕在《杂著·童难》中,进一步探讨如何理解朱熹《诗集传》与《毛诗序》的差异。他指出,虽然汉学、宋学各有师承家法,但像《风雨》《子衿》这类诗篇,“虽为朱子者,往往舍此而取彼”^④,说明朱熹本人的阐释实践也存在选择性。

《子衿》解释学的汉宋之异已如上述,《诗经·郑风·风雨》一诗的解释同样呈现汉宋之别,《毛诗序》以为“《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4]345},毛传将“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释为“风且雨,凄凄然,鸡犹守时而鸣,喈喈然”,郑玄笺注更明确其中蕴含“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4]345}之意。朱熹《诗集传》则视此诗为“淫奔之诗”,将“风雨”“鸡鸣”诸意象释为“风雨晦冥,盖淫奔之时”^{[5]84}。面对这一差异,俞莘焕提出“断章取义”的诗学阐释原则:

夫诗也者,断章而取义者也。吾则断而取之而已,何嫌乎异于朱传耶。断而取之,朱子亦然,《白鹿洞赋》不曰“广青衿之疑问”乎?衿亦以学校言。鸡独不得以贤才言耶?^⑤

他认为,朱熹本人亦运用此法,其《白鹿洞赋》中“广青衿之疑问”即取“青衿”为学校之意,那么“鸡鸣”亦未尝不可从汉训,喻指贤才持守。

朱熹《白鹿洞赋》对《诗经》学的灵活处理,符合文学从断章取义得到孳生的内在原理,这种经义修辞的丰富样态也为朝鲜学人所心领神会。如周世鹏《白云洞次朱文公白鹿洞赋》中有“惕鸡鸣以孜孜兮,法健行于天运”之句,正是取《诗经·郑风》中“鸡鸣”象征勤勉修德的汉儒寓意,以融入全赋的文教情调。这一用例与朱熹在赋中以“青衿”指代学子的用法异曲同工。出于对朱子学的尊崇,俞莘焕希望从《诗经》学的“断章取义”之法来为朱熹的取舍寻找合理的解释,但其仍强调“慎守”《诗集传》的权威,“断而取之可,舍此而取彼不可,奈何取与朱传异者,尔言是也,尔其慎守之哉”^⑥。他通过揭示朱子文学文本中的兼容性,为汉宋解释的并存提供了学理依据。

由上可见,丁若镛与俞莘焕的讨论表明朱熹《白鹿洞赋》的题材取向与意象运用,已实际参与朝鲜《诗经》学的阐释实践中。朝鲜学人不仅关注《诗集传》的经学解释,亦重视《白鹿洞赋》等文学文本中对相同意象的差异化使用,从中寻求汉宋解释之间的对话与调和。这种跨越经学与文学、融通汉宋的诠释意识,既体现出朝鲜学人对朱熹著述的整体性把握,也反映了他们在经典接受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敏感性与诠释主动。

结 语

朝鲜文人对朱熹《白鹿洞赋》的接受与转化,可置于文化记忆的理论视野中加以理解。扬·阿斯曼曾指出,“神话”与“历史”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过去,如果被固定和内化成起到奠基作用的历史,那就变成了神话”^{[6]72}。这种从“历史”向“神话”的转化,往往带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与认同建构的目的,人们通过讲述这样的历史,“让自己在面对自己和世界时可以找到方向”^{[6]73}。在朝鲜语境中,朱熹及其《白鹿洞赋》便经历了这样的“神话化”过程:朝鲜学人通过次韵、仿写等方式,不断重温并内化朱子的文教理想,使其不仅成为文学追摹的对象,更被赋予一种奠基性的文化力量,为其书院实践与集体认同提供精神指引。进一步看,这种看似重复的次韵行为对于朝鲜学人有着特殊意义,他们通过次韵模拟达到对过去的反复指涉,又从这样的指涉中实现“来自那里的光辉可以将当下和未来照亮”^{[6]75}。朝鲜学人通过对朱子《白鹿洞赋》这样富有书院实践体认意义作品的仿拟,既表达了对朱子学统的尊崇,也借此构建了自身书院生活的意义图式,并为本土文教事业的开展确立了典范、提供了动力。

从整体上看,朱熹《白鹿洞赋》在朝鲜的传播与转化,并非简单的文本移植,而是一场融合了制度借鉴、文学接受与经学阐释的多维度文教互动。在书院层面,白鹿洞书院的规制与精神被系统地吸收到朝鲜书院的创建实践中;在文学层面,次韵拟作成为朝鲜文人表达教育理念、书写书院经验的重要文体;在经学层面,《白

鹿洞赋》甚至成为朝鲜文人调和汉宋解释、拓展经典阐释空间的重要参照。这一过程,既彰显了朱熹其人其学在东亚的深远辐射力,也生动体现了朝鲜学人在接受外来典范时所展现的文化自觉与诠释弹性。

注释

①朝鲜时代(1392—1910)在文中有时也称“朝鲜”。相关研究可参:邓洪波:《朱熹与朝鲜书院》,《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李才栋:《关于白鹿洞书院在朝鲜、日本影响点滴》,《江西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李邦国:《朱熹与白鹿洞书院在朝鲜日本的影响》,《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②《白鹿洞书院记》载:“淳熙六年,南康军秋雨不时,高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视陂塘,并庐山而东,得白鹿洞书院废址,慨然顾其僚曰:‘是盖唐李渤之隐居,而太宗皇帝驿送《九经》,俾生徒肄业之地也。书院创于南唐,其事至鲜浅。太宗于汛扫区宇,日不暇给之际,奖劝封殖,如恐弗及,规摹远矣。中兴五十年,释、老之宫圯于寇戎者,斧斤之声相闻,各复其初;独此地委于榛莽。过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虽贫薄,顾不能筑屋数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续先贤之风声于方来乎!’”参见吕祖谦:《东莱吕太史集》卷六,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③按,朱熹对王安石学风的批评之语,如称其“躁率任意”“违众自用”“杜塞公论”等(参见朱熹:《读两陈谏议遗墨》,郭齐、尹波编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28—3432页),其损伤正常教育人心秩序之意可与“王氏高自贤圣之病”互释。④铺铎《复小斋赋话》指出:“赋之自注者,唯宋谢康乐《山居》一首。”参见何沛雄编著:《赋话六种》,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87页。按:赋有自注,以谢灵运《山居赋》为正式发端,此后虽非独一无二,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不多见。⑤金台俊著、张琏瑰译:《朝鲜汉文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4—87页。⑥金星洙:《辞赋文学研究》,韩国公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⑦李穡:《牧隐稿·诗稿》卷十,《韩国文集丛刊》第4辑,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79页。⑧朱熹的《感春赋》《白鹿洞赋》《空同赋》《招隐·反招隐操》均被模仿。其中,《感春赋》的拟仿之作有31篇,分别是:俞好仁(1445—1494)《感春赋》、申光汉(1484—1555)《和感春赋》、宋时烈(1607—1689)《次感春赋》、尹鐫(1617—1680)《感春赋》、李翔(1620—1690)《次朱子感春赋》、李箕洪(1641—1708)《感春赋用朱子韵》、金昌协(1651—

1708)《敬次晦翁感春赋和寄俞宁叔得一》、韩元震(1682—1751)《次朱子感春赋》、申正模(1691—1742)《感春赋》、赵观彬(1691—1757)《次晦翁感春赋》、权炳(1723—1772)《敬次感春赋》、黄胤锡(1729—1791)《感秋赋》、安仁一(1736—1806)《次朱文公感春赋》、朴灿瑛(1736—1773)《次感春赋》、崔慎之(1748—1822)《次感春赋》、赵彦儒(1767—1847)《感春赋》、洪直弼(1776—1852)《感春赋》、安寿禄(1776—1857)《次感春赋》、李源祚(1792—1871)《至夜赋次感春赋》、姜献奎(1797—1860)《次感春赋》、朴宗永(1804—?)《敬次感春赋》、李有善(1806—1885)《感春赋》、任宪晦(1811—1876)《次感春赋》、李杰(1819—?)《感春赋》、金汉燮(1838—1894)《谨次朱子感春赋》、权命奎(1840—1903)《敬次朱夫子感春赋》、李硕瓘(1846—1921)《感春赋》、姜时馨(1850—?)《拟感春赋》、李希进(1851—1882)《感春赋》、李炳鲲(1882—1948)《拟朱子感春赋》、金泽述(1884—1954)《次感春赋》。《白鹿洞赋》的拟仿之作有8篇,分别是:周世鹏(1495—1554)《白云洞次朱文公白鹿洞赋》、尹斗寿(1533—1601)《涤热台次晦庵白鹿洞赋韵》、周博(1524—1588)《次白鹿洞赋》、朴长远(1612—1671)《曲江赋次朱子白鹿洞赋韵》、李栋完(1651—1726)《壁画白鹿洞赋》、安永镐(1854—1896)《次白鹿洞赋》、赵宜阳(1719—1808)《次白鹿洞赋》、赵镐来(1854—1920)《卧龙潭赋次朱夫子白鹿洞赋用其韵》。《空同赋》的拟仿之作有4篇,分别是:闵鼎重(1628—1692)《谨次晦翁空同赋》、洪直弼(1776—1852)《和朱子空同赋》、曹秉夏(1867—?)《呻吟寓舍诵朱夫子空同赋而敬续之》、宋洛宪(1889—1943)《敏庵曹景行秉夏次朱夫子空同赋以示余忘拙续和》。《招隐·反招隐操》的拟仿之作有2篇:分别是任宪晦(1811—1876)《次朱子反招隐操》和朴现(1852—1912)《次招隐操》。⑨欧阳修《秋声赋》《憎苍蝇赋》在朝鲜的拟仿之作各有4篇,苏东坡《赤壁赋》的仿续之作有8篇。⑩周博:《龟峰集》,《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1598册,景仁文化社1995年版,第405页。⑪周世鹏是朝鲜历史上第一篇次韵朱子《白鹿洞赋》的作者。周世鹏,字景游,号慎斋、南皋、武陵道人、巽翁,尚州人,朝鲜中宗十七年(1522年)文科及第,历任成均馆大司成、户曹参判等职。其创办的白云洞书院,为朝鲜书院之始。具体创院时间是1543年(明宗在位年间),在庆尚北道荣州建立,最初名为“白云洞书院”。至1549年,朝鲜明宗赐予“绍修书院”匾额,这是首个获得官方赐额的书院,标志着朝鲜书院制度的正式开端。⑫⑬均见周世鹏:《武林杂稿》卷十别集,《韩国文集丛刊》27辑,景仁文化社1989年版,第72页。⑭朴世镛:《竹林斋文集》卷一,《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470册,景仁文化社1997

年版,第304页。⑮⑯⑰均见安永镐:《岾山文集》卷一,国立中央图书馆藏,한古朝46-가1516,第41页。⑱朴长远:《久堂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121辑,景仁文化社1994年版,第9页。⑲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二集经集第十七卷,《韩国文集丛刊》282辑,景仁文化社2002年版,第407页。⑳㉑㉒均见俞莘焕:《凤栖集》卷六,《韩国文集丛刊》312辑,景仁文化社2003年版,第102页。

参考文献

[1] 吕祖谦.东莱吕太史集:卷6[M]//黄灵庚,吴战垒.吕祖谦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86.

[2] 黄震.黄震全集:第4册[M].张伟,何忠礼,主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269.

[3] 朱熹.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第1册[M].郭齐,尹波,编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

[4]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朱熹.诗集传[M].赵长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7.

[6] 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The Disse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Zhu Xi's *Bailudong Fu* in Joseon Dynasty

Cao Hong

Abstract: Zhu Xi's *Bailudong Fu* spread widely and exerte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in the Joseon Dynasty, reflecting the profound impact of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academy system on the Joseon educational system. Zhu Xi's fu (rhapsody) sparked widespread echoes in the Joseon Dynasty through the form of rhyming imitation, becoming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Joseon Confucian scholars to express their educational ideals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rhyming creations represented by Zhou Shipeng's *Bailudong Fu* were not only imitations of Zhu Xi's literary model but also projections of his educational practices of founding academies and promoting Confucian teachings, forming a conscious inheritance of "in the composition of *Bailudong Fu* to transmit thinking in classics". In addition,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by Joseon scholars, a certain dialectical acceptance landscape with Zhu Xi's *Annotation to The Book of Songs* was formed. By engaging with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qingjin" image in *The Book of Songs* between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 Joseon scholars demonstrated an academic orientation that honored Zhu Xi's scholarship while integrating the Han learning tradition. This cross-region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interaction not only constructed a meaningful form of "cultural memory" but also gradually transformed Zhu Xi and his fu work into foundational historical resources in Joseon. Therefore, it provided a continuous spiritual impetu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academy culture.

Keywords: Zhu Xi; *Bailudong Fu*; East Asian academy cultur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interaction;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责任编辑/周舟]